

梁啟超對整理國故之理論與實踐 ：以經學為論述重心

張政偉*

(收稿日期：100年9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0年12月16日)

提要

梁啟超在1919年以前大抵是抱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面對國學與西學之間的關係。1918年12月梁啟超赴歐洲考察遊歷，親眼目睹戰火摧殘後的歐洲，也初步瞭解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的缺陷，積極反思西學的侷限。梁啟超思想至此發生重大轉變，開始質疑西方物質文明，在學術上傾向回歸傳統的路線。1919年之後國故整理思潮逐漸走向激化之際，梁啟超沒有積極參與，反而主張對西方科學或學術有限度的支持，鼓勵學者發揚東方思想的精粹，這讓梁啟超被劃入國故整理運動中的「保守派」。1922年梁啟超發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指出研究國學的兩個途徑：「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並且強調專題史、學術史寫作的重要性。之後梁啟超對經學的研究與論述，大致上朝史料的運用與學術史的寫作方向進行。梁啟超對經學的研究由早年與西學比附，至視經學為材料，再至撰寫學術史以闡明前人經學研究之成果，最後通述《儒家哲學》，嘗試義理論題開展。一層轉進一層，逐漸加深。由學術方法與觀點來看，梁啟超與西學越來越遠，卻與中國傳統學術越來越近。

關鍵詞：梁啟超、民國學術、民國經學、整理國故、經學史

*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1919年11月胡適（1891-1962）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以「評判的態度」對傳統文化進行價值重估，並將五四新文化運動定位為文化重新評價的運動。胡適明確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四項綱領。¹之後胡適在演講授課時，多次提到整理國故的重要性，並且公開發表文章、宣言，深化整理國故的內涵與方法。²胡適以及他的追隨者強調整理國故運動必須堅持批判觀點，講求科學方法以形成系統。³胡適與追隨者某些激切的言論，讓整理國故的主張與內涵，以及中西學該如何定位的問題，引發熱烈的論爭，形成歷時久遠而影響廣闊的學術論辯。⁴

梁啟超（1873-1929）早年追隨康有為（1858-1927）發揚今文經學，意欲推翻傳統經學價值基礎開始，至東渡日本辦報積極宣揚西學，乃至民初返國參政，長期熱衷於西方思想的引介。在學術研究上，梁啟超嘗試中西學互相為證，大量援引「新知」，在當時具有廣大的影響力。在某個角度上來看，新文化運動的諸多主張，梁啟超早有論述，並且具體實踐、宣揚。所以，梁啟超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如在「整理國故」的論題上，被視為早期的代表人物。⁵然而，於清末民初擁護西學，標舉革新大旗的梁啟超，對五四運動以

¹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作品集》（台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2月），冊2，頁48。

² 其中比較重要的是1923年1月，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到整理國故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整理與解釋」。胡適特別提到要以「索引式」、「專史式」的方式整理國故，利用西方現代學術知識，對國故材料進行分析解釋。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作品集》，冊2，頁245。

³ 胡適：「有系統和帶批評性的整理國故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一個部門。」唐德剛（1920-2009）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12月），頁235。

⁴ 新文化運動在20年代在北京興起，但是以全國地域與學者派別來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非暴起驟興，而是逐漸擴大其影響。請參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3月），頁183-224。

⁵ 錢玄同（1887-1939）認為「國故研究之新運動」為晚清至民初「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的思潮革新運動。錢玄同將國故研究分為兩期，第一期由1884年至1916年，稱之為「黎明運動」，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劉師培等人。見〈劉申叔先生遺書序〉，《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卷4，頁319-320。案：此〈序〉撰於1937年3月31日。

後之「整理國故」思潮，不僅沒有熱情的支持，甚至鮮明地表達反對立場。尤其在國故整理思潮逐漸走向激化之際，梁啟超呼籲人們反思西方科學或學術的侷限、弊病，鼓勵學者發揚東方思想的精粹。與當時積極宣揚整理國故的胡適等人相比，在目的與方法上有所不同，所以學者將梁啟超劃入國故整理運動中的「保守派」。⁶就在「新文化」聲勢最昂揚的時候，梁啟超在政治革新上的熱情不減，然而在學術上的論述卻日趨保守，研究重心也轉向中學。其中，較為明顯的轉變在於重新評估經學價值，並積極在著作中大量使用經學為材料，進而詮釋經學研究著作的意義。

二、對國學認識的轉變

梁啟超在 1919 年以前對國學與西學如何取舍依違或轉化融合觀點，大抵是依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開展，對於國學有很高的尊重。除了跟隨康有為時期，對傳統經學的源流與內容有激烈批判之語之外，其一生對於經學的價值抱持肯定態度。如 1896 年梁啟超應學生與弟弟企讀西學的要求，作《西學書目表》，在〈後序〉中首先提到：「今日非西學不興之為患，而中學將亡之為患。」對西學興盛與致用之利，頗有戒慎恐懼之感。梁啟超在最後提出：「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⁷中西學皆不可偏廢，但是有「本」、「用」之別。以「中學」為基礎之本，「西學」為致世之用，是梁啟超早年對中、西學術的觀點。梁啟超認為中、西學都要學習，既然有本有用之別，則必須分出先後。他在《變法通議》引述西方學制，表達先通本國之學，再求萬國之學的主張。⁸

⁶ 黃克武：「民國之後的梁啟超是『以調適之人而處於轉化盛行的時代』。……梁啟超思想變遷的方向與上述的『主流』發展截然相反，當大多數青年知識分子愈來愈激烈的時候，梁氏卻愈來愈保守。」《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 2 月），頁 179。劉黎紅：「五四時期整理國故的潮流中有兩股勢力，一為以胡適、顧頡剛為代表的新文化人士；一為以梁啟超、柳詒徵、顧實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人士。雙方在整理國故的目的、方法和態度上有明顯的不同。」〈五四時期兩種整理國故活動的比較〉，《東方論壇》第 3 期（2006 年 6 月），頁 102-107。

⁷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後序〉，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 7 月）冊 1，卷 1，頁 85-86。案：撰於 1986 年。

⁸ 梁啟超：「自古未有不通他國之學，而能通本國之學者。亦未有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西人之教也，先學本國文法，乃進求萬國文法；先求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

1897年杭州知府林啟（1839-1900）籌辦新式高等教育學校「求是書院」（民國後改制為浙江大學），梁啟超特別去函建議該校要以「中學」為經，「西學」為輔，並確立本末體用之次序，以免偏廢。⁹稍後，梁啟超至長沙時務學堂講學，主要教授《公羊》、《孟子》，以當時流行的西方民權理論解釋經義。梁啟超在〈學約〉中強調，必須先有中國經史根柢，才能進一步研讀西學。¹⁰梁啟超在東渡日本之前，是積極的孔教擁護者。東渡日本對梁啟超來說是思想轉變的重大契機，雖然流亡國外，卻也因此拓展視野，增加接觸西學的管道。¹¹此期梁啟超思索變法的失敗原因與中國的未來，遂放棄對孔教的堅持。這種放棄只是祛除孔子被神化的形象，不代表價值上的否定。

另外，梁啟超對於西學的欽慕與讚揚是根源於現實的功能性。當清末國族生存遭遇危機，又親見日本接受西方文明後的高速進展，梁啟超以為引進、援用西學，是中國富強的唯一道路。所以梁啟超積極地援用西方學術觀點或意見對中國學術進行整理、解釋，雖然多有比附牽強或理解錯誤的地方，但是在當時藉報紙刊載，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力，成為宣揚西學新知的重要媒介。有學者以為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梁啟超等人比附中西學術的工作，可視為中國傳統學術進入近代新知識體系的先聲，這些嘗試整合中、西學的工作，為日後整理國故運動做出良好的基礎。¹²但是這樣的解釋是不是能用在梁啟超身上，或可商榷。畢竟梁啟超早年鼓吹、參與變法，至東渡日本積極辦報，宣揚政治社會改革。直至後來民國建立，返國參政，最後於1917年遠離權力中樞。梁啟超此期在學術上雖有著述，但是其撰述往往不是以學術研究為目的，而是以宣揚西學與政治理念為主軸。此外，梁啟超的學思歷程來看，其中學基礎深厚，雖然熱衷西學，然而對西方學術思想或方法的理解有相當的侷限，¹³終究不如胡適等受過西方教育體制系統性學術訓練的學者來得深刻。

理，乃進求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國學校之法同也。」《變法通議·學校》《全集》冊1卷1，頁42。案：撰於1896年。

⁹ 梁啟超：「以六經諸子為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當中西兼舉，政藝並進，然後本末體用之間，不至有所偏喪。」〈與林迪臣太守書〉《全集》冊1卷1，頁145。案：撰於1897年。

¹⁰ 梁啟超：「吾愈不能不於數十寒暑之中，划出期限，必能以數年之力，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易，悉已通徹。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謂之學。」〈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全集》冊1卷1，頁108。案：撰於1897年。

¹¹ 參見崔志海：〈梁啟超：學術回顧與展望〉，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頁115-129。

¹² 關於晚清學者整理舊學，揭示融入近代知識體系問題，請參見左玉河：〈中國舊學納入近代新知是體系之嘗試〉，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頁214-252。

¹³ 根據張朋園分析梁啟超接受西方文化的歷程，在戊戌變法以前，由於吸收西方知識的來源

梁啟超觀點改變的一大轉折發生在 1918 年 12 月。此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的身分，赴歐洲考察遊歷。他親眼目睹戰火摧殘後的歐洲，也初步瞭解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的缺陷，開始積極反思西學的侷限。1920 年 3 月梁啟超返國，此後遠離政治權力中樞，投身文化教育事業，展現其豐沛的學術能量。

梁啟超自歐洲返國後思想起了重大轉變，開始質疑西方物質文明的缺陷，從此在學術上傾向回歸傳統的路線。此時中國正經歷五四運動後反傳統的思想波瀾。反傳統的另一面是擁抱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以此走向強國之路。但是在民主與科學僅能是宣傳的口號，尚無法迅速落實之際，「反傳統」成為最高亢的聲音，而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重要的構成要素，至此成為一種需要被打倒的符號、象徵。¹⁴清洗傳統，擁抱西方的主張五四運動之後逐漸興盛，而且越形激烈。許多學者、文化界人士紛紛表達對傳統與儒家的敵意，「打倒孔家店」成為響亮的口號，以為這是救國的先決條件。¹⁵儒家重要的文獻被視為腐舊的學問，許多人開始疑古，藉著疑古否定儒家核心文獻的價值。於是經學研究者堅持的神聖性被消解殆盡，學者要求傳統意義上的經學必須消失。¹⁶

梁啟超在 1915 年即針對當時否定孔子價值的呼聲寫下〈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之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復古思潮平議〉二篇文章，對孔子在文化上的貢獻與地

有限，所以所得甚淺，多「浮泛之論」。東渡日本之後，則廣泛閱讀日文譯介之西書，對他的政治思想甚有「啟發作用」。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年 6 月），頁 25-34。鄭匡民進一步研究梁啟超東渡日本時期的思想背景，認為日本的思想流派對他影響很大，而他「在日本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又是一種被『日本化』的思想。」《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年 7 月），頁 282-283。因為認知途徑的侷限，梁啟超對西方思想瞭解未能深入。其雖宣揚西學甚力，但是影響較大者僅是政治主張，傳統的思維與學養，才是梁啟超的思想主線。

¹⁴ 林毓生以「整體性的反傳統思想或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iconoclastic thought or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表達民初對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進行全面而整體的抨擊的意識型態。《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社，1983 年 7 月），頁 146-147。杜維明描述民國初年的反傳統思潮：「把中國傳統，特別是有代表性的儒家傳統歸約為封建遺毒，並以此作為一個符號，即所有中國人不爭氣、不前進、不能進入現代社會的原因。一切的問題都丟到這個垃圾箱裡。這個符號與儒家傳統解了不解之緣，好像不反對儒家不僅沒有理性，而且是自暴自棄。」《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 年 1 月），頁 325。

¹⁵ 錢玄同：「孔家店真是千該打，萬該打的東西。……不能全盤受西方化，如此這般的下去，中國不但一時將遭亡國之慘禍，而且還要永遠被驅逐於人類之外！」〈孔家店裏的老伙計〉，《錢玄同文集》，卷 2，頁 58。

¹⁶ 顧頡剛（1893-1980）：「治經學不是延長經學的壽命，而是正要促進經學的死亡，使得我們以後沒有經學。」劉起鈞：《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5 月），頁 54。

位給予高度肯定。¹⁷自歐洲返國後，面對新文化運動後越來越高漲，甚至趨向極端的反傳統的思潮相當不以為然，他在《儒家哲學》中提到：

青年腦筋中，充滿了一種反常的思想。如所謂「專打孔家店」、「線裝書應當拋在茅坑裏三十年」等等。此種議論，原來可比得一種劇烈性的藥品。無論怎樣好的學說，經過若干時代以後，總會變質，攙雜許多凝滯腐敗的成分在裏頭。……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為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如果要專打孔家店，要把線裝書拋在茅坑裏三十年，除非認過去現在的中國人完全沒有受過文化的洗禮。這話我們肯甘心嗎？¹⁸

1921年胡適在為吳虞（1872-1949）的文集作序時，稱讚其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¹⁹宣稱要把國故、「線裝書丟在茅廁裡三十年」則是吳稚暉（1865-1953）針對梁啟超〈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所發表的激烈言論。²⁰梁啟超此時的評論完全是針對這些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而發。梁啟超深刻地以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是生存的基石，文化傳承更是無法抹殺的事實。

1922年梁啟超在北京大學哲學社演講，評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出版），認為該書第一個缺點是「把思想的來源抹殺得太過」，其以為：

夏、商、周三代（最少宗周一代）總不能說他一點文化沒有，《詩》、《書》、《易》、《禮》四部經，大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作品，那裏頭所含的思想，自然是給後來哲學家不少的貢獻。……（《中國哲學史大綱》）不惟排斥《左傳》、《周禮》，連《尚書》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講古代史，若連《尚書》、《左傳》都一筆勾消，簡直是把祖宗遺產蕩去一大半，我以為總不是學者應采的態度。²¹

梁啟超認為經學文獻既是歷史材料，也是中國文化思想的源頭，更是豐富的文化遺產。如

¹⁷ 梁啟超：《全集》，冊5，卷9，頁2811-2818。

¹⁸ 梁啟超：《儒家哲學》，《全集》，冊9，卷17，頁4956-4957。

¹⁹ 胡適：〈吳虞文錄序〉，《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0年3月），集1，卷4，頁97。

²⁰ 吳稚暉：〈箴洋八股化的學理〉，《晨報副刊》（1923年7月23日）。

²¹ 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全集》冊7，卷13，頁3986。

果寫中國哲學史之類的書籍，在源頭上無法迴避經學，尤其是《尚書》、《左傳》之類本身就具有史書性質的經書，更是直接材料。如果因為某些特定立場而任意抹去，則有失學者求真的態度。

1923年胡適在《努力週報》增刊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本書目原是應清華學校（1928改制為清華大學）幾個將要前往外國留學的學生請求而撰寫，未料〈書目〉公布後，立刻引起質疑。《清華周刊》記者寫信給胡適，以為所擬的書目著重於文學史於思想史，「範圍太窄」，而這些書又「談得太深」，似乎不符合「最低限度」的要求。記者請求胡適重新擬定書目。胡適回信說明擬定書目的原則，在原開的184種書目上圈選38種，然後增加《九種紀事本末》，成為39種。

梁啟超應《清華周刊》記者之請，在胡適之後發表〈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並在文後附上〈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治國學雜話〉、〈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以經書部分來看，梁啟超在〈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皆有《四書》、《易》、《書》、《詩》、《禮記》、《左傳》。但是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開出的經書卻無《易》、《書》，《禮記》也只要求讀〈檀弓〉。梁啟超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針對此部分尖銳地批評：「連《尚書》、《史記》、《禮記》、《國語》沒有讀過的人，讀崔述《考信錄》懂他說的什麼？……思想史之部，連《易經》也沒有。什麼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復。」²²梁啟超的批評相當有力，並且在學界引發討論。然而胡適終究沒有解釋未於〈書目〉開列傳統經書的原因。²³實際上胡適所開的書目沒有激起太大迴響，反而是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因宣稱儒家經書有益道德，希望學生摘記其中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被當時激烈的反傳統者大肆批判，如吳稚暉稱線裝書可以丟到茅廁，陳問濤稱此為「國學遺老化」。²⁴

梁啟超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與〈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都提到胡適在經學文

²² 梁啟超：〈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全集》，冊7，卷14，頁4245。

²³ 關於梁啟超、胡適這兩份國學書目的比較問題，可參見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頁145-159。董德福雖然積極地為胡適辯解書目的開列原則與用心，但最後也認為就書目的對性而言，胡適的書目的確「不太合適」。董德福還以為梁啟超在1925年前後發表關於書目解題、文獻評介與治國學方法的專論，包括《中國歷史研究法》、《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有為青年解決讀古籍難題的用心。彷彿梁啟超這些著作是延續〈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而寫，這樣的論述沒有考量到梁啟超在史學方面的學術思路，也忽略古籍佔有史料方面的重要地位的觀點。

²⁴ 陳問濤：〈國學之「遺老化」〉，《學燈》第5卷第16號（1923年10月16日）。

獻上的缺漏問題。梁啟超的批評代表著：無論是專門的學術史研究，或是象徵文化傳承的必讀書籍，經學文獻都有其重要性。其意義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經學的，更是傳統的、文化的，如此才能保有國性的完整。

1921年梁啟超於天津南開大學講述歷史研究方法問題，次年出版《中國歷史研究法》。本書對於中國歷史研究有較完整的理論與操作方法的建構。《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到經學文獻的在史料價值方面的問題：

群經之中如《尚書》，如《左傳》，全部分殆皆史料。《詩經》中之含有史詩性質者亦皆屬純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餘如《易經》之卦辭、爻辭，即殷周之際絕好史料。如《詩經》之全部分，如《儀禮》，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絕好史料。因彼時史跡太缺乏，片紙只字，皆為瓊寶，抽象的、消極的史料，總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遞推，則《論語》、《孟子》，可認為孔孟時代之史料；《周禮》中一都分，可認為戰國史料；二載《禮記》，可認為周末漢初史料。²⁵

以六經皆存史料的角度來面對傳統經典。於是，每一部經書都有相對應的歷史材料意義，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素材。經學文獻既視為史料，則必要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才能有堅實可信的論述，這也是梁啟超一貫的意見。²⁶

該書提出史學著作的具體方向：

今日所需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專門史如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專門史者，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²⁷

梁啟超以為歷史研究需走向專門課題與通史性質兩種不同的著作上。梁啟超也提出研究歷史的方法：

²⁵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全集》，冊7卷14，頁4112-4113。

²⁶ 梁啟超在為學生劉節（1901-1977）《洪範疏證》題記時提到：「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令反駁者極難容喙。」《全集》，冊9卷18頁5274。案：作於1927年。

²⁷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全集》，冊7卷14頁4105。

吾儕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後，尚須對於此事運吾思想，駢吾批評。雖然，思想批評必須建設於實事的基礎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將為枉用，其批評將為虛發。須知近百年來歐美史學之進步，則彼輩能用科學的方法以審查史料，實其發軔也。²⁸

梁啟超以為要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歷史研究，在資料整理之後，進行詮釋，賦予意義。一切意義的基點在於資料處理的正確性，這是研究價值的重要基礎。梁啟超很重視「求真」的學術態度，以為不管問題大小，重要的是求真的研究精神與過程。²⁹

1922年梁啟超發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指出研究國學的兩個途徑：「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對於文獻的學問，梁啟超特別說明：

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為無用者，拿他當歷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歷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我們只要把這種方法（科學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³⁰

梁啟超以為時人宣揚「整理國故」之類的主張，主要是處理知識體系轉換以及解釋的問題。這類的問題以文獻用途的角度來看，就是將其當成歷史材料，然後用「科學方法」處理，使之成為有學術價值意義的知識。

梁啟超進一步指出文獻的學問可以開發的種類很多，如「文字學」、「社會狀態學」、「古典考釋學」、「藝術鑒評學」等，其中對「古典考釋學」的努力方向，梁啟超以為：

我們因為文化太古，書籍太多，所以真偽雜陳，很費別擇。或者文義艱深，難以索解。我們治國學的人，為節省後人精力而且令學問容易普及起見，應該負一種責任，將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審定一番，解釋一番。這種工作，前清一代的學者已經做

²⁸ 同前註，頁4138。

²⁹ 梁啟超：「吾又以為善治學者，不應以問題之大小而起差別觀。問題有大小，研究一問題之精神無大小。學以求真而已；大固當真，小亦當真。一問題不入吾手則已，一入吾手，必鄭重忠實以赴之。」同前註，頁4129。

³⁰ 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全集》，冊7，卷14，頁4067。

得不少。我們一面憑借他們的基礎，容易進行；一面我們因外國學問的觸發，可以有許多補他們所不及。³¹

梁啟超此處提到「審定」與「解釋」，亦即鑒別真偽，以及整理、解釋後的知識，以增進學習效率，也可達到知識普及的作用。梁啟超以為這方面的工作可以利用清儒的研究成果，加上西方學術的啟發，可以在學術進程上達到更新的作用。

梁啟超提出的治國學第二條道路是發揚德性的學問，「此學應用內省及躬行方法來研究，與文獻學之應以客觀的科學方法研究者絕不同。這可說是國學裏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應當領會的。必走通了這一條路，乃能走上那一條路。」梁啟超以為「整理國故」不僅有知識性的文獻整理，還要有「道德哲學」上的整理與傳承。梁啟超自歐洲返國後，對西方的文明、思想開始懷疑，進而開始宣揚中國文化的優點。是以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梁啟超對西方機械文明導致人民生活枯燥感到憐憫，並以為西方哲學以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方式並沒有實質上的意義。梁啟超以為中國的儒家、佛教思想可以解救西人物質生活的貧乏，對國故中蘊含的人生哲學寶藏深具信心。這種態度轉變相當微妙。梁啟超自日本流亡之時，仍相信西學可以拯救中國的苦難。當梁啟超目睹歐洲工業、物質文明的弊病後，卻呼籲要以中國的「人生哲學」來拯救西方的心靈。這不僅展現出文化平等的觀點，³²由另外一的角度看，梁啟超想要以中國哲學、思想進行文化建設工作，這是他此期提出最引人矚目的救國方法。

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的認識大致如〈治國學的兩條大路〉分為「文獻」與「德性」兩種方式，皆是「整理國故」的重要內容。以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文獻的研究是主要內容；以對人生的價值來看，「德性」的學問才是根本。不過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梁啟超所謂的文獻的學問，不僅是經學，而是中國一切傳統典籍；德性的學問，不僅是儒家，而是中國的一切哲學思想。梁啟超學問淵博，興趣多方，本非一家所能囿限。³³

³¹ 同前註，頁 4068。

³² 〔美〕列文森（Joseph R. Leveson）：「（梁啟超）準備再一次為中國的文化聲望辯護，而且他現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維護文化的平等。」劉偉、劉麗、姜鐵軍譯：《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頁 290。案：據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翻譯。

³³ 研究梁啟超文獻學的專門著作有吳銘能：《梁任公的古文獻思想研究初稿：以目錄學、辨偽學、清代學術史及諸子學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1997年）、彭樹欣：《梁啟超文獻學思想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5月）。

三、經學史料的運用

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時期發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本文利用聲韻學以及《尚書》、《春秋》、《周官》、《禮記》、《史記》、《爾雅》、《說文》等材料，論述八個中國原始時代之民族分布、活動與文化特徵。文後附有〈史記匈奴傳戎狄名義考〉、〈春秋夷蠻戎狄表〉，則以《史記》、《春秋》為基本材料，考察先秦之外族活動、歷史。³⁴此期梁啟超堅持今文經學觀點，引證不取古文經。

1917年11月梁啟超隨段祺瑞(1865-1936)第二次內閣總辭而卸下財政總長職務，於是開始潛心著書。梁啟超原欲撰作「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二書，不僅擬定寫作計畫，³⁵也有十餘萬字的著述。後因赴歐洲考察，遂無成書。這些著述後來都以論文形式發表。其中有〈陰陽五行說之來歷〉(1920年發表)，在先秦源流部分，以《易經》、《尚書》、《詩經》材料討論陰陽五行說法的來源。³⁶另外被視為研究先秦宗教與政治關係極為精闢的〈志三代宗教禮學〉(1920年發表)，則論述先秦以教為政，以禮為法的現象，主要運用的研究材料為《易》、《尚書》、《詩》、《左傳》、《周禮》、《禮記》等書。

另有《太古及三代載記》(1922年發表)有〈古代傳疑章〉，附〈三苗九黎蚩尤考〉、〈洪水考〉、〈古代民百姓釋義〉；〈紀夏殷王業〉章，附〈論後代河流遷徙〉、〈禹貢九州考〉、〈又禹貢九州考〉；〈春秋載記〉章，附〈春秋年表〉；〈戰國載記〉章，附〈戰國年表〉。這些論述最主要的研究素材為《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對上古至戰國時代之歷史發展進行多方面的描述。這篇論文篇幅較長，論證嚴謹，材料編排很有次序，展現出梁啟超歸納整理歷史材料的傑出能力。《太古及三代載記》耗費梁啟超近兩年時間，原為「中國通史」之寫作而撰，後僅止於三代。《中國歷史上之民族研究》(1922年發表)，利用的材料更家豐富，主要有《尚書》、《詩經》、《左傳》、《論語》、《孟子》、《戰國策》、《國

³⁴ 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全集》，冊6，卷11，頁3419-3434。案：本文作於1906年。

³⁵ 梁啟超：〈原擬中國通史目錄〉、〈原擬中國文化史目錄〉，《全集》，冊6，卷12，頁3593-3602。

³⁶ 梁啟超：「陰陽兩字相連屬成一名辭表示無形無象之兩種對待的性質，蓋自孔子或老子始。孔老以前之書確實可信者，一曰《詩經》，二曰《書經》，三曰《儀禮》，四曰《易經》之〈卦辭〉、〈爻辭〉。《儀禮》全書中無陰陽二字，可置勿論。」〈陰陽五行說之來歷〉，《全集》，冊6，卷11，頁3357。

語》、《史記》等，考察中國諸種族發展之大略。這些著作引進西方當代史學方法，結合多種學科，對單一論題進行探究，體現梁啟超的史學觀點。以上諸文多有涉及歷史人文地理學，成為中國此領域之先河。³⁷

梁啟超於 1920 年以淺近的白話寫出《孔子》，第一節「孔子事蹟及時代」提到關於孔子生平、事蹟主要以《史記》〈孔子世家〉為底本，「拿《左傳》、《論語》、《禮記》及其他先秦子書來參證，或可以比較的正確。」³⁸第二節「研究孔子學案所根據的資料」言：「六經雖然都是舊日所有，經過孔子的手，便成為孔子的六經。所以說六經是孔子的著述，亦未為不可。但這六部經裏頭添上孔子的分子之多少，各經不同。」其後各節為「孔學提綱」、「孔子之哲理論與《易》」、「孔子之政治論與《春秋》」、「結論」等。另有〈世界偉人傳第一編：孔子〉殘稿。³⁹尚有〈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一文，全文僅有三節，第三節「孔子所衍生之學派」僅講至《孟子》。⁴⁰

另有〈周秦時代之美文〉寫作年代不詳，約在 1922 年至 1924 年間，本文很短，應該是草稿。第一章「《詩經》之篇數及其集結」完整，第二章「《詩經》的年代」僅有數行。第一章談及《詩經》的篇章數目與孔子是否刪《詩》的問題，字數不多。本章附有〈釋四詩名義〉，對「南」、「風」、「雅」、「頌」之名義提出解釋。⁴¹

梁啟超以經書為歷史材料的觀點，是基於歷史研究的操作層次上說。其《太古及三代載記》提到：

不知經訓本與史籍殊科，經以明義，非以記事。（近儒或倡六經皆史之說，實偏見也）史實足借以明義者采之，否則置之，此孔子刪定《詩》、《書》，筆削《春秋》所以為大業也。……故群經中記載涉及史事者，誠不失為較確之史材。然必欲混經史以同其範圍，叫其道反為兩失。⁴²

此處涉及到經學文獻的意義問題，梁啟超以為經書是歷史研究的材料，所代表的歷史時代

³⁷ 石瑩麗：《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以跨學科為中心的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第 2 章「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先行者」，頁 37-64。

³⁸ 梁啟超：《孔子》，《全集》，冊 6，卷 11，頁 3123。

³⁹ 梁啟超：〈世界偉人傳第一編：孔子〉，《全集》，冊 6，卷 11，頁 3155-3157。

⁴⁰ 梁啟超：〈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全集》，冊 6，卷 11，頁 3319-3325。案：本文作於 1920 年。

⁴¹ 梁啟超：〈周秦時代之美文〉，《全集》，冊 8，卷 15，頁 4384-4388。

⁴² 梁啟超：《太古及三代載記》，《全集》，冊 6，卷 12，頁 3453。

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是思想的黃金時代，因此可以利用經書為素材，考察先秦思想意義。是以，經學在文獻上具有歷史的與經學的兩種意義。然而，就文獻整理的角度來看，將經書作為史料，在操作上的確較為便利，

尤其某些經書本身就具有史書性質，如《尚書》、《春秋》等。⁴³但是，梁啟超早年深受今文經學影響，在利用這些材料上頗為謹慎。如其引證不取古文《尚書》，另外在使用古文經材料上，也盡量做到多方互證，或是重新解釋文獻意涵。如梁啟超於《要籍解題及其讀法》，⁴⁴以為《左傳》應該與《國語》同編，但是被劉歆抽出部分，改為編年，並有一部分文字是劉歆竄入。然而「大部分蓋本諸當時史官之實錄」，所以認為：

《左傳》一書，無論其原本為分國紀載或編年紀載，要之不失為一種有系統有別裁的作品，在全人類歷史學界為一先進者。……欲斷代的研究國史，當以春秋時代為出發點。若侈談三代以前，則易為神話所亂，失史家嚴正態度。若僅注重秦、漢以後，則中國國民性之根核，社會組織變遷之脈絡等，將皆無從理解。故吾常謂治國史者，以清代史為最要；次則春秋、戰國。而春秋時代幸有一《左傳》，吾儕宜如何珍惜而寶習也！⁴⁵

與前期攻擊《左傳》，並且在著述中排除徵引的情況，可見梁啟超此期對於古文經成見已稍有改變。這種改變象徵著此期梁啟超對學術研究的徵實精神，超越早年所堅持的經學家法或是政治的目的。除了具有史書性質的經書之外，其他經書也有歷史研究上的意義，如《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提到：

現存先秦古籍，真贋雜糅，幾于無一書無問題。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寶者，《詩經》其首也。故其書于文學價值外尚有一重要價值焉，曰可以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

⁴³ 梁啟超：「純以記事為職志完書傳于今者，惟《左傳》與《國語》。次近古者，則史遷之《史記》，今述古代史，則《尚書》、《春秋》以外，惟當信據此三書，夫人而知之矣。」同前註。

⁴⁴ 梁啟超於1925年整理清華大學講課紀錄，刊出《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該書講述《論語》、《孟子》、《史記》、《荀子》、《韓非子》、《左傳》、《國語》、《詩經》、《楚辭》、《禮記》、《大戴禮記》等書之編輯者、作者、年代、真偽、內容與價值、讀是書之法、相關書籍等基礎知識，書後附〈先秦學術年表〉。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全集》，冊8，卷16，頁4617-4674。

⁴⁵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全集》，冊8卷16，頁4649。案：作於1925年。

度。⁴⁶

梁啟超以為《詩經》來源絕無問題，必為春秋初年以前之作品。其中有許多史詩，可為直接史料。可由這些史料，判斷其他同期史料的真偽。另外，某些經書的價值在於可以做為專門史的素材，如《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提到：

《禮記》之最大價值，在於能供給以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學術思想史之極豐富之資料。蓋孔氏之學，在此期間始確立，亦在此期間而漸失其真。⁴⁷

因此，研究先秦學術思想流變的專門史研究論題上，《禮記》就是重要的研究材料。梁啟超對經學或經學成果的研究大致上符合《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敘述，即設定研究課題或方面，然後以經學文獻為材料，進行專門史或文化史的寫作。

梁啟超對於經學文獻的基礎研究工作，比較重要著作為《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他特別提到：

有許多偽書，足令從事研究的人，擾亂迷惑，許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為偽書所誤。研究的基礎，先不穩固，往後的推論、結論，更不用說了。……幾千年來，許多學問，都在模糊影響之中，不能得忠實的科學根據，固然旁的另有關係，而為偽書所誤，實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講辨偽、考證年代之必要。⁴⁸

辨偽與年代考證工作是使用文獻前的基礎工作，這些資料的真偽、性質、年代、來源無法確定，或是無法限制在某個限度之下，則研究工作很難開展，所得的意義也將無法穩定。這部份的研究成果牽涉到經學文獻成為歷史材料的可能性及其相關的應用範圍。考證辨偽工作在歷代學者的努力下，已經做了許多豐碩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清代學者的研究成績作為基礎，經學文獻的真偽、年代、源流、內容，已經有長足進展。梁啟超對此項工作並沒

⁴⁶ 同前註，頁 4657。

⁴⁷ 同前註，頁 4671。

⁴⁸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全集》，冊 9 卷 17，頁 5009。案：是書為 1927 年梁啟超於燕京大學課堂講述，其學生周傳儒、姚名達、吳其昌筆記。

有特殊的貢獻，只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進行整理擇取的工作。《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共三卷，卷一部分對辨別偽書的必要性、偽書的種類與來歷、辨偽的歷史與方法、偽書的評價等進行講述。卷二、三則開闢專章，專講十三《經》之訛偽問題。梁啟超主要參考胡應麟《四部正訛》、宋濂《諸子辨》、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萬斯同《群書疑辨》崔述《考信錄》等書，以及清代辨偽學的研究成果，講述各書之真偽問題。

整體來看：梁啟超以經書為歷史材料進行研究工作很早就開始，但是以 1920 年自歐洲返國為界線，可分為前後期。前期數量較少，水準較低，且文中流露濃厚的政治意圖與思想，又喜與西方學術進行連結對比。後期數量較多，水準較高，能專就文獻材料進行整理分析，並且進一步詮釋意義。

梁啟超在 1926 年至 1927 年之間於清華國學研究所講述「中國歷史研究法」，對過去《中國歷史研究法》進行補充與局部修正，梁啟超對當時史學研究風氣提出批評：

發現前人的錯誤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專在瑣碎的地方努力，專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還有許多許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譬如鄭玄箋注的《毛詩》、《三禮》已夠研究了，反從《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去輯鄭注《尚書》和《易經》，以為不得。乾嘉以來的經學家便是這樣風氣。其實經學不止輯佚，史學不止考古……大規模做史的工作很難，因為盡管史料現存而且正確，要拉攏組織，并不容易。⁴⁹

梁啟超以為當時的史學研究針對某些局部資料進行研究，卻不知還有大批的史料等待整理、分析。過去梁啟超以為問題不論大小，只要有求真的正確研究態度，就值得鼓勵。現在梁啟超卻修正之前的看法，治史的格局要大，應該要有貫通整理大量材料的能力。

⁴⁹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全集》，冊 8，卷 16，頁 4875。

四、撰寫專門學術史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發表於1920年，⁵⁰為五四運動以後第一部清學史專著。《清代學術概論》十五天完成初稿，以六萬餘字的篇幅敘述清代學術演變大要，因此在短時間內以簡約篇幅敘述大範圍的論題，缺漏在所難免。⁵¹《清代學術概論》全書共分三十三節，並無標目，類似札記體式，但是首尾完整，對清代學術的描寫具有整體性。本書第一至三節概括時代思潮的概念，並以此展開對清代學術思潮的變遷的原則性歸納。梁啟超借用佛教生、住、異、滅流轉之相，將清代學術分為四期：啟蒙期（生），代表人物有顧炎武、胡渭、閻若璩；全盛期（住），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蛻分期（異）：代表人物主要有莊存與、劉逢祿、魏源、龔自珍、廖平、康有為、梁啟超；衰落期（滅），代表人物是俞樾（1821-1906）、孫詒讓（1848-1908）和章太炎（1869-1936）。

梁啟超提出清學發展與意義是「以復古為解放」，這是解釋清代學術發展的重要論點。梁啟超約略說明這個概念：

綜觀二百餘年之學術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此處以「解放」說明「復古」，即表示在學術發展過程中某研究對象群被解析闡發至某一高度，而產生解釋的僵化或思想上的桎梏，則回溯更前階段的學術研究對象群，以消

⁵⁰ 《清代學術概論》首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為主篇名，刊載於《改造》第3卷第4、5期。後經梁啟超修訂，於1921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日人渡邊秀方隨即於次年翻譯全書，由東京二酉社出版。《清代學術概論》為學術界的暢銷書籍，單行版本眾多。朱維錚於1985年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進行校注，後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合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這是大陸學界較常用的文本。臺灣則有徐少知在朱維錚校注的基礎上進行勘誤校對，於1995年由台北里仁書局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

⁵¹ 目前所知最早為《清代學術概論》進行辨正工作者為李詳（1859-1931），其有〈清代學術概論舉正〉，然今未見，僅留存目。參見李稚甫：〈二研堂全集序錄〉，收入《李審言文集·附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下冊，頁1464。辨正此書較著名之論文為楊勇：〈清代學術概論考正〉，《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3期（1969年3月），頁1-14。

除解放此種解釋或思想的羈絆。因此「復古」是一種進化，「解放」是追求學術的自由。就梁啟超此段的說法，則清末今文經學、諸子學研究大興，即代表自孔、孟以下的所有學術研究累積下來的歷史牽制都已消解，學術研究獲得全部解放，得到完全自由。梁啟超的解釋成為後來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重要觀點。不過，「以復古為解放」的解釋奠基於歷史進化觀與今文經學的立場上，忽略了學術思想上的內在承續關係，而引起頗多爭論。⁵²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梁啟超於 1923 年冬至 1925 年春於清華學校（1928 年改名「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任教時所編寫的講義。書中後半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成績〉先行於 1924 年發表，⁵³約至 1929 年全書集結，發行單行本。⁵⁴

整體看來梁啟超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並不完整。本書可以切割成兩個部分來看，而其中並沒有良好的銜接。可以說前半部（第一至十二節）是「清初思想史」，後半部（第十三至第十六節）是「清代考據學史」。

第十三節至第十六節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記敘清代學者在經學、小學及音韻學、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傳記及譜牒學、曆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之發展與成就。梁啟超將考據學衍生的各種學門學科加以分類，對其

⁵² 陳居淵考察清代學術研究史中對於清代學術發展的五種學說：章太炎「反滿說」、梁啟超與胡適「理學反動說」、錢穆「每轉益進」說、侯外廬「每轉益進」說、余英時「內在理路說」，對其理論觀點與基本意涵有歷史性的考察，對於其間學說的演變與質疑有扼要說明。詳參陳居淵：〈20 世紀清代學術史研究範式的歷史考察〉，《史學理論研究》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87-97。

⁵³ 梁啟超於 1924 年 4 月 23 日致書張元濟徵詢刊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事：「頃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本清華講義中一部分，現在欲在《東方雜誌》先行刊出（因全書總須一年後方能出版）。但原文太長，大約全篇在十萬字以外，不審與《東方》編輯體例相符否？」引自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7 月）冊 4，「民國 13 年先生 52 歲」條，頁 1601。後該文連載於當年 6 月至 9 月《東方雜誌》第 21 卷，12、13、15、16、17、18 號。

⁵⁴ 李國俊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時間歸於 1924 年，稱有「民志書局單行本」。《梁啟超著述繫年》（江蘇：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226。朱維錚：「我見到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版本有三種：一九二九年上海民智書局版。一九三二年中華書局版《飲冰室合集》的專集第十七冊。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的單行版。」《梁啟超論清學史之二種·引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年 6 月），頁 2。據楊克己於 1938 年所編之《民國康長素先生有為梁任公先生啟超師生合譜》後所附之〈本年譜引用及參考書目表〉中，提到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於 1926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案：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之資料，得知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最早的版本應為 1926 年 7 月上海民志書店所出版。參見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哲學·心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 133。

學術的起源與發展和學者、著作的具體成績進行綜合評述。不僅描述出每學門學科的內容與意義，更重要是對其歷史與現況的評論與介紹，可以視為清代學術著作發展的具體提要，對清學史研究的人來說是很精到的入門書。⁵⁵這部分的著述將清代考據學的研究成果有條理地歸納，材料蒐集豐富，評論適切，顯現梁啟超對於清代考據學成果有很高的水準的掌握。

梁啟超在清華學校講課時很明確地表達預備將課堂講義彙編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前半部內文高度口語化以及敘述較為雜亂的情況來看，應是自編教學講義或是學生整理的上課紀錄。本書前半部屬於思想史性質的講義應未完成，只講述至清初學術發展。這或許是當時梁啟超的身體與家庭狀況已不堪持續這種大型的學術著作撰寫。另外，講義屬於授課需要而撰寫，因此依照前半部細緻深入的講述內容進行，課程能否講述至清代晚期之思想也是問題。思想部分雖然只寫至清初，然而對清代中葉的學術卻有豐富的論述，這就是後半部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⁵⁶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是完整地將考據學成績，分門別類地歸納條理，以歷史演進的方式敘述，這種論述方式是以「學術」為中心，而非人物師從的繼承關係。因此，此部分展現出來的樣態與前半部迥然有異，呈現細緻而富理則的風格。梁啟超如此敘述考據學的成绩，很能表現考據學在研究上的「累積」特色。思想的傳承有很大的選擇空間，但是考據學的推進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持續探究，在學術上具有很高的傳承性。梁啟超的敘述表明了考據學下的各個學門學科，對於前人的研究繼承與對後學的貢獻。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術概論》的關係在主要觀點上沒有太大改變。但是在內容與編排上讓這兩部書呈現不同面貌，就結構上來說，《清代學術概論》類似總論性質，雖然簡略，但也首尾一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深入探討學派、學者、學門學科的發展，但是詳細的分論下，整體性就稍嫌薄弱。材料方面則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多於《清代學術概論》，尤其在學者的生平方面與著作的內容、評述方面更是詳細。但是總體來看，兩書的承接關係相當明顯，簡單地說《清代學術概論》像是簡介，而《中

⁵⁵ 杜蒸民：〈一本研究清代學術的入門書——重讀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第2期（1994年6月），頁29-34。

⁵⁶ 周國棟以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所以未完成，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害怕與以前寫的《清代學術概論》在組織上重複。」〈兩種不同的學術史範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史學月刊》第4期（2000年8月），頁112。

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是承接前者，進行細部論述了。⁵⁷

《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專門史」類的著作。其中涉及大量清代學者的經學研究成果，可視為經學史研究，對經學研究的發展上很具有意義。另外，兩部專著也可視為梁啟超口中的文獻的國故整理的具體實踐。尤其梁啟超本身的經歷，讓他不僅對清代經學有深刻的掌握，其對西方史學與民初積極引進的現代學術體系有直觀的了解，所以，他所撰寫的學術史在材料選擇與意義詮釋上，都有異於前人。在此點上，梁啟超的學術史不僅是對國故的整理，更是引領國故走出傳統，進入現代的意義與價值。⁵⁸

除清代學術史之外，梁啟超最有學術價值的專題史著作當屬《先秦政治思想史》。⁵⁹是書雖只講先秦時代的政治思想，但是學術史上卻是開啟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先聲，為民國以後較早的政治思想史專著。⁶⁰此書將先秦分為部落期（唐虞迄殷末約千餘年）、封建期（西周約三百年）、霸政期（周東遷后至孔子出生前約二百年）。梁啟超在「前論」部分第一章「時代背景及研究資料」中分析各種材料的性質及其可信度，最後言：「本篇所采資料，以《詩經》、《尚書》、《國語》、《左傳》為主，而慎擇其餘，庶幾可以寡過云爾。」⁶¹本書底本雖為講稿，但是經過較為精細的整理，在引證方面大致完備。

1927年梁啟超有《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在敘述中國古代社會組織情形時，多以五經為研究素材。⁶²本年最重要的著作是《儒家哲學》，本篇為梁啟超於1925年至1926年於清華學校的授課講義彙整而成，為貫串先秦至清代的專門史著作，內容講述二千五百

⁵⁷ 李開、劉冠才：「該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部清代主要學者的學案摘要與學派要論，它用為豐富的史料進一步論證了《清代學術概論》的主要觀點，彌補了《清代學術概論》在史料方面的某些薄弱之處，使其在內容方面更加縝密、嚴整和全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術概論》異曲同工，相輔相成。」《晚清學術簡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頁253。

⁵⁸ 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頁5-6。蔣廣學：《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頁305-342。

⁵⁹ 本書是梁啟超1922年年底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東南大學之課堂講稿，192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⁶⁰ 民國以後最先出現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書籍應為謝無量（1884-1964）《古代政治思想研究》，於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⁶¹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全集》，冊6，卷12，頁3612。

⁶² 本書共分〈母系與父系〉、〈婚姻〉、〈家族及宗法〉、〈姓氏〉、〈階級（上）〉、〈階級（下）〉、〈鄉治〉、〈都市〉八章。凡提及先秦制度、社會組織者，多用五經為證。梁啟超：《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全集》，冊9，卷17，頁5079-5129。

年以來儒學思想的沿革、重要人物、研究方法與重要問題討論。⁶³本書可見梁啟超對儒家思想的掌握相當全面，敘述極有條理，與當時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主張相對照，梁啟超藉著理性的整理分析，對儒家思想與發展進行歸納，進行「現代詮釋」的工作。⁶⁴

梁啟超對諸經有很深的認識，但是他並沒有固守一家。他將經學文獻視為歷史材料，然後隨著研究目的或論題設定的需要，將各部經書加以剪裁，以專門史的形式闡述意義。當然，梁啟超以為經學不只是歷史材料，更是「德性的」學問，也將其列入整理國故的重要工作。然而，梁啟超受限於從政、講學等諸多外在限制，其著作不是與政治相關，就是課堂講稿，這種外緣環境限制，影響其著作內容與呈現方式，更讓他很難有機會以文字表述「德性的學問」。是以梁啟超雖然知道內在反思的德性學問相當重要，但是他並沒有形諸文字，建立理論，這或許與其家庭狀況與壽算有關。1925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講「儒家哲學」時，其夫人過世。此後梁啟超健康狀況不佳，至1926年入協和醫院，卻被誤割腎臟。至此，梁啟超為病痛所苦，終至過世。其學術文化之著述，亦隨著病情加劇而快速減少。梁啟超在人文學者思考力最顛峰的時期，遭遇病痛，乃至於身故。這讓他沒有機會進一步在文獻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刻的德性學問的探究與論述。

回顧梁啟超的著作，他沒有做過輯佚鉤沉的工作，也沒有瑣碎的考證文章。他擅長以宏觀的角度進行研究，對於大量資料的處理條目分明，歸類清晰。但是，梁啟超受到傳統的影響仍深，其學術史著作仍不脫傳統的架構與思維。⁶⁵梁啟超能利用西學，對學術史現代化工作，踏出很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他對學術最大的貢獻。

五 結論

1927年梁啟超對當時爭議許久的學校讀經問題提出看法，他說：「吾自昔固疑讀經之難，固頗袒不讀之說，謂將經語編入教科書已足。吾至今亦仍覺其難也，然從各方面研究，

⁶³ 梁啟超：《儒家哲學》，《全集》，冊9，卷17，頁4954-5008。

⁶⁴ 對梁啟超《儒家哲學》進行「現代詮釋」的問題，請參見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4月），頁117-142。

⁶⁵ 關於梁啟超史學觀點與著作之演變、貢獻、侷限等問題，可參見汪榮祖〈論梁啟超史學的前後期〉，收入李喜所主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頁96-120。

漸覺不讀之不可。」梁啟超舉出五點理由，其中第一點是「經訓為國性所寄，全國思想之泉源，自茲出焉。廢而不讀，則吾儕與吾儕祖宗之精神，將失其連屬，或釀國性消失之病。」⁶⁶梁啟超晚年對於經學義理價值的體認越加深刻，認為經學之閱讀、認知關係到國性、文化命脈之絕續問題。梁啟超對一生對經學的態度，雖然維持尊重與肯定的基調，⁶⁷但是綜觀其歷程卻有程度上的差異：由早年與西學比附，至視經學為材料，再至撰寫學術史以明前人經學研究之成果，最後通述《儒家哲學》嘗試義理論題開展。一層轉進一層，逐漸加深。由學術方法與觀點來看，梁啟超與西學越來越遠，卻與中國傳統學術越來越近。⁶⁸雖然梁啟超此期著作沒有了過去的強烈批判性，但是其宏觀的論述與精到的評價，允當地重新估計國學的价值，尤其對經學材料的利用或價值認識，在當時的學術界，仍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對中國現代學術進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所以當反傳統的浪潮消退，當時學者對梁啟超整理舊學成績，給予很高的評價。⁶⁹

⁶⁶ 梁啟超：〈學校讀經問題〉，《全集》，冊9，卷17，頁4933。

⁶⁷ 張灝：「梁（啟超）在內心裏基本上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在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上是有辨別力的。」葛平夫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2月），頁207。

⁶⁸ 余英時：「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論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頁459。

⁶⁹ 郭湛波：「整理成績最佳、影響最大的就算胡適、梁啟超、馮友蘭。」《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頁208。案：原書前身為《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修改後訂為《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於1936年出版。

徵引文獻

- 石瑩麗：《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以跨學科為中心的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12月）。
-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哲學·心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 杜蒸民：〈一本研究清代學術的入門書——重讀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第2期（1994年6月）。
-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1月）。
- 吳稚暉：〈箴洋八股化的學理〉，《晨報副刊》（1923年7月23日）。
- 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7月）。
- 吳銘能：《梁任公的古文獻思想研究初稿：以目錄學、辨偽學、清代學術史及諸子學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1997年）。
- 李國俊：《梁啟超著述繫年》（江蘇：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
- 李稚甫：《李審言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
- * 李開、劉冠才：《晚清學術簡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
- * 李喜所主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 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4月）。
- 余英時：《論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
-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7月）。
- * 周國棟：〈兩種不同的學術史範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史學月刊》第4期（2000年8月）。
- 胡適：《胡適作品集》（台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2月）。
- 胡適：《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0年3月）。
-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12月）。
- * 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3月）。
- 梁啟超著、朱維錚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之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
- *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
-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6月）。
- 張灝著、葛平夫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2月）。

- * 彭樹欣：《梁啟超文獻學思想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5月）。
- *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2月）。
- 楊勇：〈清代學術概論考正〉，《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3期（1969年3月）。
- 楊克己：《民國康長素先生有為梁任公先生啟超師生合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10月）。
-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
- * 劉起鈞：《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5月）。
- 劉黎紅：〈五四時期兩種整理國故活動的比較〉，《東方論壇》第3期（2006年6月）。
- 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 錢玄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
- 陳問濤：〈國學之「遺老化」〉，《學燈》第5卷，第16號（1923年10月16日）。
- *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
- * 陳居淵：〈20世紀清代學術史研究範式的歷史考察〉，《史學理論研究》第1期（2007年1月）。
-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
- 蔣廣學：《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
- 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
-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7月）。
- 〔美〕列文森（Joseph R. Leveson）著、劉偉、劉麗、姜鐵軍譯：《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Ju-Yuan,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Research Pattern of Qing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iography Quarterly*, 1(2007).
- Chen Ping-Yuan, *Zhong Guo Xian Dai Xiao Shu Zhi Jian Li*(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 Li Kai,Liu Guan-Cai,Wan Qing Xiao Shu Jian Shi (Nan Jing: Nan 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Li Xi Suo(ed), *Liang Qi Chao Yu Jin Dai Zhong Guo Wen Hua* (Tianjin: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Liang Qi-Chao, Zhang Pin Xing(ed), *Liang Qi Chao Quan Ji* (Beijing: Beijing Publish,1999)
- Liu Qi-Yu, *Gu Jie Gang Xian Sheng Xiao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6)
- Huang Ko-Wu, *The Rejected Path:A Study of Liang Chi Chao's Accommodative Thinking* (Taipei:Institued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1994)
- Peng Shu-Xin, *Liang Qi Chao Wen Xian Xiao Si Xiang Yan Jiu* (Beijing:Guangming Daily Press,2010)
- Sang Bing, *Wan Ching Min Guo De Shiau Ren Shiau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
- ZHOU Guo-D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wo Academical History of China of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Written Separately by Liang Qi Chao and Qian Mu",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4(2000).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Reorganization about Cultural Heritage of Liang Qichao :Focus for the Classics

Chang, Cheng-wei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1; Accepted December 16, 2011)

Abstract

Before 1919, Liang Qichao believed the tradition academic was the core, the West academic may used. He visited to Europe in December, 1918. He saw the destruction in Europe for the war,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hortcoming of the industry civilization and the capitalism, and started to ponder the limit of Western academic. Therefore the Liang Qichao thought had th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 After 1919, the intens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pinion were appeared unceasingly, Liang Qichao encouraged the scholar to develop the Eastern thoughts. Liang Qichao regard as the conservative faction scholars for this. In 1922, Liang Qichao said the tradition academic should move towards th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and the moral research. And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the academic method and the viewpoint, Liang Qichao received the West academic influence to be more and more low, moves towards the Chinese tradition knowledge gradually.

Keywords: Liang Qichao, Republic of China academic, the study history of the Classics of Republic of China, reorganiz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the study history of the Classics

